

李大钊建党思想的逻辑蕴涵研究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吴向伟, 朱安安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武汉 430072)

摘要: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回答了“为什么建党、建设怎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初步构建了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建党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中国化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全面系统地研究李大钊的建党思想,对于缅怀李大钊的丰功伟绩和崇高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李大钊;建党思想;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1)01-0007-07

DOI:10.16160/j.cnki.tsxyxb.2021.01.0002

On Logical Connotation about Li Dazhao's Thought on the Founding of CPC: in Honor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CPC

WU Xiang-wei, ZHU An-an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Having combined Marxist party theory with the practical reality of Chinese revolution, Li Dazhao answered a series of basic questions about the party founding in a creative way, such as “why to found it, what kind of party to found, and how to found it”. He developed a preliminary party-founding thought with rich-connotation and rigorous logic, and made a historic contribution to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arty theory. On the occasion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CPC, studying Li Dazhao's thought on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in a systematical wa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ommemorating Li Dazhao's great achievement and lofty spirit, and promoting all-out strict Party governance to further development.

Key Words: Li Dazhao; party-founding though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Marxism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学术界研究李大钊建党思想的成果颇丰,但主要集中于某一方面的研究,如李大钊建党思想的形成背景和历史过程、主要内涵和特点等,而

从“为什么建党、建设怎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样一个逻辑理路展开的整体性的研究,目前并不多见。因此,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全面系统研究李大钊建党思想,对于缅怀李

作者简介:吴向伟(1967—),男,湖北大悟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大钊的丰功伟绩和崇高精神,始终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为什么建党

无产阶级只有建立自己独立的政党,才能胜利完成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曾强调指出:“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1]406}在李大钊看来,要改造中国社会,实现国家昌盛,有赖于建立一个坚强的政党。然而,民国初期兴起的政党,都不可能承担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旗帜鲜明地提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主张,回答了为什么要创建共产党的问题。

从青少年时代起,李大钊就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立志改造中国社会,“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2]301}。为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2]297},李大钊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赴日本留学,全面系统学习西方现代政治学说。受西方民主、自由观点影响,李大钊认识到要实现民族解放,必须实行现代政党政治。早在1912年他就阐述了政党与国家昌盛的关系,指出:“党非必祸国者也。且不惟非祸国者,用之得当,相为政竞,国且赖以昌焉。”^[3]1921年3月,他又强调:“一方注意团体的训练;一方也要鼓动民众的运动,中国社会改革,才会有点希望。”^{[4]349}

现代政党政治,即是民主政治,它是封建专制政治的对立物,“民主与专制不并存”。李大钊指出:“几千年专制之压迫,思想之束缚,和消极的、懒惰的、厌世的学说之浸染,闹得死气沉沉,组织的能力都退化了。然而中国社会腐败到这个样子,又不能不急求改革。”^{[4]349}

封建专制主义政治造成中国长期动乱不止,必须与之彻底决裂。于是,李大钊开始关注西方现代政党制度,认为应在中国实行西方的政党政治。他指出:“十九世纪以来,政党之发达,则人类组织能力之进步,又极可惊。”^{[4]348}“英、美政治纯受政党支配,其政党都有极繁复之机关”,其“势力雄厚,直与政府并驾,甚或称

为第二政府”,“至于欧、美社会方面,只要有两人以上的公同行动,就成一个团体的组织”,“由小扩大,所以议会、政党,亦都行之若素”^{[4]348}。

然而,残酷的现实政治却让李大钊失望了。民国初年,国内政党林立,出现了不下三百个政党。然而,大多数政党只是昙花一现,不仅没有带来中国的稳定和繁荣,而且种种政治乱象频出。李大钊对此极为不满,他愤然指出:“入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植党营私,呼朋啸侣,招摇撞骗,捧大老之粗腿,谋自己的饭碗,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指望由他们做出些改革事业为人民谋福利,只和盼望日头由西边出来一样。”^{[4]349}由此可见,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幸福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不三不四政党的身上,简直是痴心妄想。

中国现存的政党都不行,但改造中国又离不开政党,那又应该怎么办呢?李大钊指出:“近二三年来,人民厌弃政党已达极点,但是我们虽然厌弃政党,究竟也要另有种团体以为替代,否则不能实行改革事业。”^{[4]349}1917年4月,李大钊明确提出,应当创建一种新的“中心势力”,这一势力是“拥有国民的势力”,应“顺世界文明之潮流”,“由中流社会之有恒产者自进而造成”^{[5]175-176}。这清楚地表明:李大钊热切盼望新的政治力量来取代中国现存的政党,以担负起改造中国的历史重任。只是这时他没有也不可能明确提出建立共产党的主张。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正在寻求建立新政党的李大钊看到了曙光。李大钊一向关注俄国革命的动态,在研究俄国二月革命时,他说:“此次革命之成功,则泰半为社会党运动之效果。”^{[5]191}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政党的伟大作用,他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开明宗义地指出:“俄国革命最近之形势,政权全归急进社会党之手,将从来之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根本推翻。”^{[5]329}正是因为有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坚强领导,俄国革命才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1921年3月,李大钊考察世界革命运动发展趋势,明确提出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任

务。他指出:“最近时代的劳动团体,以及各种社会党,组织更精密,势力更强大。试看各国罢工风潮及群众运动之壮烈,不难想见。俄罗斯共产党,党员六十万人,以六十万人之大活跃,而建设了一个赤色国家。这种团体的组织与训练,真正可骇。”^{[4]348} 只有在中国组建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4]350}。

蔡和森在考察了世界革命运动的形势后,明确指出:“观此亦可知世界大势所趋。……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否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劳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6]69} 李达在对1917年的俄国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进行对比研究后,明确指出:“无产阶级要实行革命,必须有一个共产党从中指导,才有胜利可言。”^[7]

经过不断探索和思考,李大钊得出的结论是:既要改造中国,就要有一个革命政党。当然,这个政党“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它们是不可能担负起改造中国社会的重任的。这个政党只能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4]350}。只有建立这样的政党,中国社会的彻底改革才有希望。

二、建设怎样的党

俄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呢?李大钊指出:“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5]364} 1920年8月,蔡和森旗帜鲜明地提出:“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6]52} 要彻底改造中国社会,就必须建立一个俄式的政党。李大钊阐述了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纲领和策略等问题,回答了在中国创建一个怎样的党的问题。

(一)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

革命导师列宁明确指出,“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8]。通过对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研究,李大钊对建立一个怎样

性质的党有了清楚的认识。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党的早期组织时,曾就党的名称写信询问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明确回复叫共产党。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蔡和森致信毛泽东阐明了党的性质,他明确指出:“党(社会党或共产党)。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6]22} 1921年3月,李大钊阐明了党的性质,他鲜明地提出,“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它是由“中国C派的朋友”组成的“强固精密的组织”^{[4]350}。因此,这个政党要依据第三国际建党原则加强建设,“使各方面都名实相符,成为工人阶级政党”^{[9]48}。李大钊还强调不能把共产党和社会党混为一谈,他指出:“社会党人的运动是半有产阶级的运动,共产党人的运动是无产阶级的运动。”^{[10]106}

(二)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

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有科学的世界观和科学理论作指导。共产党的先进性首先表现在它有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基础。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是李大钊。李大钊认为十月革命之所以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5]364} 1919年8月,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李大钊明确宣称:“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4]53} 并深刻阐述了主义即革命理论的指导作用,他指出:“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4]54}

蔡和森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主义明确”的党,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回信中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他还明确指出,对于中国问题,“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11]497},“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1]498}。

共产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与体系。李大钊指出:“马氏以前也很有些有名的社会主义者,不过他们的主张,不是偏于感情,就是涉于空想,未能造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与系统。”^{[4]4}“然自马氏与昂格思合布《共产者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4]19-20}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4]2},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科学理论武装自己。

(三) 共产党必须坚持正确的纲领和策略

党的纲领是党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最近目标以及达到这一目标的道路和方法。1918年,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论证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确信“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5]367}。1919年他又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这就明确了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华民族要实现独立和富强,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李大钊坚信:“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4]354}但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近代中国前进的“二重障碍”,这二者又是相互依存的,“所以,中国的民族运动应该是既反帝又反军阀”^{[2]1},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联合统治的社会制度。即是说,共产党必须坚持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还必须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最近目标。

要实现党的纲领,必须采取正确的策略原则。李大钊指出:要实现反帝反封建的最近目标,“任何主义者,我们以为都应该在这时抛弃一切武断的成见,客观的考查中国的实际情形,应该在此时共同认定一联合的战线(United Front),用革命的手段,以实现民主主义为前提”^{[2]515};在联合战线中,“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10]226},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2]98},知识分子必须到农村去,组织和教育农民;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应该“扶助他们”“帮助他们”。

(四) 共产党必须以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区分真假共产党的试金石。1919年8月,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根本解决”的思想。他指出,解决社会问题不能仅仅靠“一点一滴的改良”,“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4]55}。所谓“根本解决”,就是要走俄国式的暴力革命道路。面对强大而残暴的内外敌人,李大钊指出:“我们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要以革命的手段实现民主主义,要连根带蒂的拔除督军制度以实现民主主义。”^{[2]515}1922年双十节之际,李大钊旗帜鲜明地强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暴力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是挽救中国的唯一方法。陈独秀曾强调:“马格斯底《共产党宣言》自第一页到最末页都是解释阶级战争底历史及必要的讲义。”^{[12]96}

无产阶级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反动阶级的政权后,必须建立自己的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李大钊指出:“在革命的时期,为镇压反动者的死灰复燃,为使新制度新理想的基础巩固,不能不经过一个无产阶级专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的时期。”^{[10]104-105}陈独秀强调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许有产阶级得到政权的意思,这种制度乃是由完成阶级战争消灭有产阶级做到废除一切阶级所必经的道路。”^{[12]96}共产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才能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

(五) 共产党必须是有铁的纪律的“坚固精密的组织”

共产党是一个严密的有组织整体。列宁强调:“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1]510}共产党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也才能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1920年,蔡和森曾明确提出:“党的组织为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6]52}

民国初年全国出现了三百多个政党和团

体,为什么大多数很快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呢?就是因为这些政党,“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4]349}。李大钊指出:“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依托!”^{[4]350}即是说,共产党必须是有严格纪律的“真正钢铁般的组织”,严格的组织纪律是党坚强有力、能够担当民族解放重任的保证。

(六)共产党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党

人民群众是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力量源泉,共产党应该是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党。李大钊强调,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没有人民的拥护与参与,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惟一的基础”^{[4]262}。他指出:“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4]280}所以,先进分子必须到工农群众中活动,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李大钊发出了“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的号召。

李大钊指出,现在世界上最痛苦、最悲惨的人就是那些劳动的人。“所以我们要打起精神来,寻着那苦痛悲惨的声音走。我们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5]439-440}共产党要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关注人民群众的疾苦,为解除他们的苦难而努力奋斗。

(七)共产党必须坚持国际主义原则

各国无产阶级只有紧密团结,互相支援,才能取得革命事业的胜利。李大钊指出,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5]377}。

从世界范围来考察,国际帝国主义都是我们的敌人,而全世界革命的工农阶级则都是我

们的朋友。李大钊明确指出:“因中国受国际压迫(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各阶级是相同的,所以实行时应当与资本中等……阶级联成一气,使中国成一独立者,不受国际压迫者之国家。惟最后应注意尚有国际资本阶级……亦应打破。社会主义的运动,当然以国际为范围,因为经济情形是国际关系之故。”^{[10]248}一句话就是“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众”^{[2]298}。共产党不应带有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色彩,而应加强同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团结与合作。

三、怎样建设党

1945年5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精辟概括了毛泽东的建党路线,即:“首先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13]早在建党之初,李大钊从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等方面,初步回答了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一)注重党内思想教育,确保党员正确认识党的理论和纲领

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共产党人必须共同信守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经过比较,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集合起来。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实际领导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研究会的宗旨明确了“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1920年8月,李大钊明确提出,少年中国学会“应有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4]267},这里的主义当然是“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强调,党内同志必须明白对革命事业“必须抱定目的和宗旨”^{[10]219},这就是:“一,我们要认清我们的团体。我们的团体是全被压迫的民族的前驱,我们的革命是为全人类的,所以我们的牺牲是值得的。……二,我们要认清我们的党和党纲。我们的同志,在党中做过多年工作的,然而有许多不明白我们的党和党纲,这是很危险的。我们要明白我们的党纲是科学的,很自然的,很合乎人道的,因此我们的党是光明正大的。”^{[2]46}

为了让党内同志认识党的理论和纲领、坚定政治信仰,李大钊十分重视在党内开展思想教育。第一,在日常的组织生活中加强党员教育。他不仅劝告党员要认真学习、精读革命理论书籍,还经常为党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第二,在北京支部设立教育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学习党的指示和决议。第三,领导北方区委创办了第一所区委党校,并利用寒假集中培训党员干部,他同赵世炎、陈乔年等党的其他领导同志在党校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党的知识以及国内国际形势等课程。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必须同各种错误思潮作坚决斗争。李大钊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明确指出:“无政府主义是主张无政府者,与社会主义绝对相反。”^{[10]246}他不仅从理论上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而且将黄凌霜等劝退出北京党组织。李大钊还领导和参与了对国家主义和戴季陶主义的批驳,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促进了全党在思想上的统一。

(二) 注重提高党员质量,坚持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

列宁曾指出:“徒有虚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14]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显示了伟大力量。李大钊特别强调要从工农和知识分子中吸收真正革命的同志入党,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建立“劳动家的政党”,其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北京早期党组织一经成立,就深入到工人中去,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和工会,注重启发工人阶级觉悟,吸收其中先进分子加入党组织。严格入党条件,是共产党“强固精密”的重要保证。对不合格党员,必须坚决清除出党,以纯洁党的组织。北京早期党组织中混进了几个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反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党员必须遵守党的纪律”等规定,李大钊组织北京党组织成员,展开了广泛的辩论,最终没有接受他们的要求,并劝告他们退出了党的组织。

1922年7月,党的二大决定党加入共产国际,并明确宣布:“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

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15]43}二大党章明确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15]62-63}李大钊堪称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楷模。他在主持北方区委工作时,一直坚持集体领导制,凡重要决策,均通过会议慎重研究,详细讨论,多数决定,然后付诸实施^{[9]46}。李大钊本人也自觉按照党章的规定向中央请示和汇报工作,严格按照党内政治生活规则办事。

共产党是有严格纪律的党。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明确提出共产党要有集权精神与铁的纪律。这是由党的性质、宗旨以及历史使命所决定的。李大钊明确提出:共产党必须避免国民党内“不能令党员绝对服从命令”的现象,党员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自觉遵守政治纪律;党的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党的同志应自觉遵守保密纪律,不能公开的绝对要保密;党员应严守廉洁纪律,杜绝腐败现象发生。李大钊自己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决定,至死都严守党的机密,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不愧是严守党的纪律的模范。

(三) 倡导三大作风,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16]三大优良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集中反映了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民群众和自己同志的正确态度。李大钊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但他实际上是三大优良作风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

理论联系实际,是共产党人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不能离开中国的实际

去应用马克思主义。“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4][51]}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它“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4][51]}。这段话发表于1919年8月,它清楚地说明了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内倡导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人。

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是共产党人对待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和观点。李大钊谴责民国时期那些不三不四的政党,自我标榜“代表人民、解除人民痛苦”,实际上却鱼肉人民,花天酒地,心中根本就没有人民。他批评改组前的国民党,不仅“组织松懈”,而且“同群众有较少联系”。共产党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真正代表着人民群众的利益。李大钊经常告诫大家:只有深入群众才能领导群众,只有不脱离群众才能指挥群众。他重视群众工作,经常深入到工农群众中,站在群众斗争的最前沿,与群众同生死、共患难,并常常教育身边的同志“不要脱离群众”。他为共产党人密切联系群众树立了榜样。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共产党有生命力的表现,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效方法。任何政党和个人,都不可能没有缺点与错误,问题是怎样对待缺点和错误。蔡和森曾指出:“不要怕群众,不要怕讨论或批评。”^[17]共产党人应本着对党、对人民、对同志高度负责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纠正错误、弄清思想和团结同志的目的。李大钊一生追求“民族解放的事业”,勇于承担责任,敢于克服自己的缺点和错误。1922年5月,胡适提出了“好人政府主义”,主张由全国所公认的“好人”组建一个政府,具体举措包括:废督裁兵、制定宪法、财政公开、南北议和、整顿官制等。李大钊认为这是一种差强人意的办法,也就同意了担任提议人。但中共中央讨论认为,“好人政府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它将会引导国人走入改良幻想,并起草文件批评了这一主张。李大钊得知中央的精神后,明确表示中共中央的意见是正确的,立即作了

自我批评。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全体党员通过决议,一致拥护中共中央的主张。

综观上文所述,李大钊基于对中外政党政治的考察和思考,明确提出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能担负起改造中国的重任;他以俄国共产党为榜样,阐述了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纲领和策略等问题;他从党的建设实际出发,阐述了如何开展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等问题。即是说,李大钊初步回答了“为什么建党、建设怎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一系列问题,构建了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建党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党的建设发展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

参考文献:

- [1] 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3]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
- [4]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5]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6]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7] 李达.李达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33.
- [8] 列宁.列宁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38.
- [9] 人民出版社.回忆李大钊[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10]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11] 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 [12] 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 [13]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30. (下转第59页)

- [17] 李隆基. 大唐六典[M]. 李林甫, 注, 陈仲夫,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188.
- [18] 王钦若. 册府元龟: 卷四九四[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5909.
- [19] 薛居正. 旧五代史: 卷一四六[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1952.
- [20] 杨耀田. 敦煌变文《茶酒论》成书时间浅析: 从由唐至宋杖刑的演变来分析[J]. 戏曲与俗文学研究, 2019(1): 336 - 344.
- [21] 王溥. 五代会要[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 [22] 温海清. 数字“七”在内亚人群中的呈现及其意涵: 迄于蒙元时代的初步考察[J]. 中古中国史研究, 2018(1): 93 - 122.
- [23] 魏收. 魏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2988.
- [24] 令狐德棻. 周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617.
- [25] 脱脱. 辽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89.
- [26] 王恽. 玉堂嘉话: 卷三[M]. 杨晓春,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86.
- [27] 李延寿. 北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111.
- [28] 罗新. 黑毡上的北魏皇帝[M].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4.
- [29] 道森. 出使蒙古记[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20 - 21.
- [30] 岑仲勉. 突厥集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167 - 168.
- [31] 路易·巴赞. 古突厥社会的历史纪年[M]. 耿昇, 译.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4: 236 - 237.
- [32] 海西希. 蒙古的宗教[M]. 耿昇, 译.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6.
- [33] 恩斯特·卡西尔. 神话思维[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166.
- [34] 苗润博. 《说郛》本王易《燕北录》名实问题发覆[J]. 文史, 2017(3): 141 - 155.
- [35] 郑思肖. 心史: 下卷[M/OL]. 清江苏巡抚采进本. [http://www. bookinlife. net/ book-166058-viewpic. html# page=1](http://www.bookinlife.net/book-166058-viewpic.html#page=1).
- [36] 鲁同群. 《心史》是一部伪书[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4(1): 40 - 42.
- [37] 宫崎市定. 宋元时期的法制与审判机构: 《元典章》的时代背景及社会背景[M]// 杨一凡, 寺田浩明. 日本学者中国法制史论著选: 宋辽金元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98.
- [38] 脱脱. 金史: 卷四十五[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 [39] 丘濬. 大学衍义补: 卷一百四[M/OL]. 吉澄, 校刊. 明嘉靖三十八年刻本: 12a. [http://www. guoxuedashi. com/guji/7028z/](http://www.guoxuedashi.com/guji/7028z/).
- [40] 谢深甫. 庆元条法事类[M]. 戴建国, 点校.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749 - 750.

(责任编辑:李秀荣)

(上接第13页)

- [14] 列宁. 列宁全集: 第3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215.
- [15]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1卷[M]. 北京: 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 [16]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093 - 1094.
- [17] 蔡和森.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108.

(责任编辑:李秀荣)